

1965年,我和苏孝业参加国家科委组建的成昆铁路统筹规划课题组,到大西南参加成昆铁路建设。课题组共18人,由中科院运筹研究所、运输研究所,中科大,山大,山师,曲师几个单位参加。课题组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华罗庚教授,副组长由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副主任艾提、中科院运输研究所工程师潘文美两位同志担任。

大西南三线建设,包括成昆铁路、攀枝花钢铁厂等建设项目,毛主席非常重视,邓小平同志亲自抓,由彭德怀、李井泉等同志任三线建设总指挥。1965年8月,参加成昆铁路建设的有关单位,先集中在成都马家花园,学习、讨论工程的有关问题,接受保密教育。20天后,我们开赴工地。

奔赴工地时,我们分为两路,七个人乘坐一辆英国吉普,由潘文美同志带领去铁道部的工程所在地,我分在这辆车上。苏孝业他们由艾提副主任带领,乘大车,去铁道兵的工程所在地。我们的汽车司机姓苏,刚从大车司机调过来。我们10点多钟从成都出发,经过眉山县的时候已近下午一点,为了赶到峨眉山保国寺吃午饭,车子加快了速度。当过一个S形路段的时候,第一个弯过去,过第二个弯时司机猛地刹车,车头调了个180度的头,四轮朝上,翻进了六米多深的稻田里。我当时只

【曲师记忆】

华罗庚带领我们修成昆铁路

□初学岛

感到轰的一声,就昏了过去。是稻田里的农民把我们从小车里抢救出来。当苏孝业他们赶到的时候,都惊呆了,司机当时昏死过去,经士仁老师的头皮,从眼眉往上一直撕裂到头顶,满脸是血。李师正老师的腰椎断裂,痛得说不出话来。其余的人除我以外,都受了伤。当时经士仁伤后头靠在我的腰部,当把我

拉出车时,血顺着我的大腿往下淌,把我吓晕啦。我因惊吓,十多天的时间内服再多的安眠药就是睡不着觉。我们回到成都,经士仁、李师正在成都华西医院疗伤,其余人员休养一个月后开赴工地。三线建设就是战斗,死亡的考验没有吓倒我们。

成昆铁路从四川的成都到云南的昆明,全程1096公里。铁路经过大、小凉山,穿越大渡河、金沙江。沿线山势陡峭,奇峰耸立,沟壑纵横,深涧密布,地形和地质条件极为复杂。它的建成为人类在复杂地质建设高标准铁路创造了范例,堪称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。我们驻扎在铁道部所属的工程指挥部甘洛县,说是一个县城,也就是一个七八百户的村庄那么大。大、小凉山住的全是彝族同胞,非常落后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,研究、编制公路运输方案,提高公路运输效率;到各工程处推广统筹方法,加快工程进度;进行部分三角网测量的计算。

铁路建设的物资,开始是通过公路由汽车运输的,高山峻岭地质复杂,公路开在半山腰。很多路段是通过定向爆破产生的,有的地方路面宽只有3米,路的下面非常陡峭,见不到底。汽车行驶在很多单行道上,很多会车点只能容纳几辆车。面对这样的路况,我们考察后画出线路图,应用“最大流”的方法,计算出车辆的最

大通过能力,制定最佳运输方案。我们通过电话在会车点指挥车辆通行。冬天我们冒着严寒,在大渡河大桥桥头值班指挥车辆通行。

铁路建设工程有很多工序,怎么安排能缩短工期,提前竣工,这属于统筹安排的数学问题。我们在各个工程处,推广统筹方法。华罗庚院士,在各工程处的工程负责人大会上,由浅入深,从引入简单的例子开始讲解统筹方法。他举例说,客人来了,要让客人尽快喝上茶水,怎么安排时间最短?当然是先烧水,趁水开的时间,拿茶叶,洗茶杯。这个简单的例子,包含着“统筹方法”的数学理论。一个大的工程有几百道几千道甚至上万道工序,怎么从这些工序中把最长的工序称之为“主要矛盾线”找出来,缩短主要矛盾线上的工期,整个工程的工期就提前了。我们在各个工程处带着华罗庚院士的专著《统筹方法》,给工程技术人员讲解“统筹方法”,帮助他们分析、寻找“主要矛盾线”,以达到缩短工期的目的。

我们在成昆铁路工地上,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,因为“文革”,1966年5月,我们课题组的人员被调回到各自的单位。而工地的工人、工程技术人员,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,继续进行成昆铁路的建设。1971年成昆铁路全线贯通,开创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。

【风物】

麦香如故

□张金凤

日头朗照,麦叶泛黄,空气中弥漫着麦之将熟的香气,那香是一种灵药,瞬间将村庄唤醒。端午粽香荡漾的村庄,镰刀在石头上嗷嗷地叫,村头是碾场的身影。

人们在村头选一块平整的空地,用耙把地翻一遍,打碎坷垃,泼水浸泡。在睡足了湿地上,撒上麦糠和灶底灰,拉碾子一圈圈碾轧。

场轧好了就等开镰。麦子从地里割回来要“铡场”。铡场常常在黄昏或者晚上。收工早的,天黑前摆下铡刀,铡刀那雪亮的刃闪闪发光,把乡村的黄昏映照得一片雪白。“咔嚓,咔嚓”,年轻的接着铡刀柄,年长的将麦捆子放进铡刀口,麦穗垂在外侧,麦秸草留在手边这一侧,掌铡刀的年轻人迅速将铡刀按下,一猛子劲,铡刀落地,麦草纷飞,铡得干脆利落。也有那生手,“咔嚓,咔嚓”,越铡那麦子越像棉线,柔软难断,那放麦子的老把式就站起来,将铡刀高擎,一脚轻踩垂在一遍的麦穗,“咔嚓”一声,干脆利落,后生看得心服口服。

打场的时间选择在午后两点左右,正是一天中最热,麦子晒得最焦爽的时候,恨不得风一碰就崩裂出麦粒。一头温驯的老牛或者精干的驴子,拉着碌碡或碾子在骄阳下转圈,戴斗笠的男人,不时吆喝一下牲口,调整着它的步幅。一遍遍地翻看着麦秆,一遍遍地碾轧。等那毛隆隆的麦穗软塌塌铺在场院上,就该“起场”了。用木杈、四股杈将麦秸挑起,抖净藏在草里的麦粒,然后才将麦秸又走,这时候的麦秸叫做麦瓢了。起走了草,就剩下粮和糠,混着麦糠的麦粒拢成堆才算起完了场。

“扬场”就是把麦粒和麦糠分开。木锨迎风扬起混合物,麦糠较轻被风吹走,留下麦粒则哗哗落下。有风的时候,扬场简单,只要将一木锨带着麦糠的麦粒斜着扬出去,风就给分得很明白,麦粒落地,粒粒饱满,麦糠就飘开了,像一场蒙蒙的雪。倘若响晴无风,扬场就见了高低。手艺差的,一木锨撒出去,麦粒麦糠又齐刷刷落到一起,仿佛那生死不离的情侣,经过一刹那颠簸,仍然抱紧着过日子。那人就懊恼地把木锨一扔,在场院角点上根烟,等风来。女人不放弃,在重新和好的麦子前用扫帚掠几下,企图通过自己的扫掠,分离出粮食。好把式此时不紧不慢,一木锨撒出去,麦糠落在原地,麦粒却斜飞出去,干净利落落地落在旁边的空地上。他的手艺招来那些轻浮的后生,老把式淡淡一笑,说:“靠风扬场那叫本事?”有学识的后生仔,看着看着就明白了门道,回去操起木锨慢慢也有了样子。

扬场的副手做着“掠场”的活计。男人一锨一锨有板有眼地扬,女人待扬几锨就要进到中间去用大扫帚掠出没有飘出来的麦糠。扫掠力度均匀,将未飞走的麦糠扫走。那些堆积如金沙的麦粒,在日头的蒸腾下散发浓烈的香气,在场院劳作的人就像被一坛老酒熏醉了似的,摇摇晃晃着腿脚,憨笑着。孩子们抽空就跑进麦粒的堆里去,越堆越高像小山一样的粮食,把孩子顽劣的翅膀收回来了。

如今,一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,一趟走过去,就将田里个个精神抖擞的麦子直接分离成粮食和草。那打麦场上的旧时光,永远定格在记忆深处。那些辛劳和企盼,交织着满足和汗水,成为一种深深的怀念。

【老照片】

黄河大米药山“造”

□王高宽

上世纪60年代后,黄河大米走红济南,应该说是药山人叫响的。这幅照片摄于1962年7月14日,是稻改前进行水文调查期间,在济南西郊吴家堡村外拍摄的(前排左二为作者)。

上世纪60年代之前,黄河南岸农田盐碱化非常严重,小麦、玉米等农作物往往减产甚至绝产,当地民谣“二月青,三月黄,四月误不了种高粱”,形象地说明麦苗被碱死的过程。为了扭转这种贫困局面,济南市决定改造盐碱地。1962年上半年,以市科委为主,城建、水利部门和农科所相互配合,组建了10人的专业队伍,其中有干部、工程师、技术员和测量员,对沿黄农村的水文、地形进行勘察测量。经过数月普查,发现利用地表水排碱行不通。正在这时,获知河南省引黄河水灌溉压碱,改种水稻的信息,遂决定以药山、小鲁庄大队为基地、在药山公社进行试点,利用小鲁庄和徐庄两处虹吸工程的三条虹吸管,提取黄河水灌溉,压碱肥田种水稻。

刚开始,生产大队怕担风险,不愿插手。市科委遂出面做后盾,拨出科研经费,派出技术骨干,若实验成功,效益归生产大队,如失败,后果由市科委承担。最终药山人叫响了黄河大米这个品牌,也为改善济南人的生活开拓了新途径。



栾调甫(1889—1972),蓬莱人,名延梅,别号山东侏子,书斋曰“三经堂”。先生幼年家贫,仅上过5年学,15岁立志破解《墨经》,殚精竭虑,以致双耳失聪,7年后终于写出《名经传》。此后继续研究墨学并闻名于世,是当时四大墨学大师之一。此外,他还精于经学、文字学、金石学、版本目录学、农学。上世纪中前期与王献唐、路大荒等高举朴素求真“齐鲁学派”大旗,学界并称“山左三杰”。他因耳聋而甘守寂寞,却与梁启超等名家结下了深厚友谊。

1925年10月的一天,梁启超风尘仆仆地从天津来到济南齐鲁大学面见校长,说要会见栾调甫,可是校长和幕僚竟然都不识其人,查遍花名册也不见栾调甫名字。几经查询,有人提供线索说在中文系代课,兼管看守学校大门的聋子就叫栾调甫。一个临时工当然不会在册,也难怪校长等都不知有此人。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为什么奔波千里急于寻找看大门的临时工?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原来上世纪20年代初,国学大师梁启超利用20多年精力写成《墨经校

【人物撷英】

齐大看门人 梁启超千里寻访

□朱晔

一是此前从没人敢太岁头上动土;二来此人的批评又确实言之有理,不能不让人服气。梁任公决心会会此人,于是有了千里寻访“把门大将军”的佳话。

再说栾调甫,那时他在齐鲁大学博医会当小小翻译员,一家5口租住在山水沟的一间半边是灶屋半边是土炕的陋室内,家境十分寒酸,这种小人物当然不会有人理睬,所以家居闹市无人知。

起初,栾调甫得知梁书《墨经校释》出版大喜过望,忙请上海亲友代买一套。拜读之后,却大失所望。他对梁先生书中的校释颇多异议,认为“本书最大的缺点,是校释内随意改字、删字”,势必贻误后世。于是在山水沟毛家坟那个四合院的茅草屋里,苦战两天两夜,写成《读梁任公墨经校释》一文。因无处投稿,他只好亲手刻蜡版,油印文稿40份,拜托北京《哲学》杂志社代转梁启超、章太炎、胡适等名家。其实,栾调甫送文稿时,梁正在济南。那时梁为交流学术,经常来济南访友,只因因素无接触以致近在咫尺,却如隔天涯。栾调甫信封只写收信

人姓名,不写发函人姓名地址。信封内不见信函一字,唯有稿件一篇,颇让梁感到“惆怅不可言”。细读文稿之后,再翻出自己的旧作自检一番,深感“武断失解处诚不少”。梁启超顿觉此人功底不凡,便急于寻找此人,两年后终于在上海张仲如处得知栾调甫的下落,又过了半年两人总算见了面。

梁栾相见甚欢,畅谈数日。梁公看到栾处境艰难境遇坎坷,十分痛惜,毅然代燕京大学以高薪聘请。不几日,齐鲁大学突然聘请栾为该校教授,从此彻底改变了命运。

梁启超不仅慧眼识人,而且“到处逢人说项斯”。他在《清代三百年学术史》中认为,栾调甫研究墨学的“造诣,即使不是绝后,也是空前”。他称赞栾的论文“所抒皆独见无蹈袭”。他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栾的坚白论离盈两宗之说,“此种发明。可谓石破天惊!”正是由于梁先生的奖掖,栾调甫的墨学研究成果才得到了学界的认可。新中国成立后,栾调甫曾任职省博物馆,受聘为山东文史馆馆长,于1972年病逝。

释》一书,在墨学界影响甚大。此书出版不久梁大师意外地收到《读梁任公墨经校释》的文章,对他的观点提出尖锐批评。文章署名栾调甫,却不知道许人。读过此文,梁大为惊讶,